从新市政厅到“波士顿学派”：一座城市的粗野主义建筑“革命”

From New City Hall to Boston School：A City's Revolution with Brutalist Architecture

杨震 | YANG Zhen 陈烨 | CHEN Ye

摘要：市政厅建筑在粗野主义实践中占据相当比例，但在既有研究中尚未得到深入探析。波士顿新市政厅是影响最大的粗野主义市政建筑之一。本文回顾了它的建设背景及设计哲学，详细分析了它的设计特征（包括：外观形态、内部空间、材料构造、外部广场），阐述了它在“建筑美学与文脉、功能与公共空间”两方面的争论。进而探讨了它基于与文化—城市复杂关联的革命性影响，包括：推动“波士顿学派”兴起、促进波士顿城市转型、对更大范围内建筑学实践与观念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从“意识形态流变”的视角总结了新市政厅的价值及社会评价，并从“历史遗产”的维度对新市政厅的历史定位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粗野主义、市政厅建筑、波士顿新市政厅、波士顿学派、建筑革命

Abstract: City hall buildings are in the major category of Brutalist architecture while they have not been deeply explored in existing studies. Boston New City Hall is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Brutalist civic buildings. The paper reviews its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design philosophy, analyzes in detail its design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its form, internal space, material, construction and external square）, and reveals profound arguments in terms of aesthetic, urban context, function and public space. The paper elaborates its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in complicated relevance to culture and city, including making the rise of Boston School, stimulating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Boston, and imposing a wider impact on global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and perceptions.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concludes the values and social evaluations of the New City Hall through vicissitudes of ideologies, and forecasts its historical posi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heritage.

Keywords: Brutalism, City hall buildings, Boston New City Hall, Boston School, Architectural revolution

一、引言：粗野主义建筑概述

1. 粗野主义理论与观念

粗野主义（Brutalism）是1950—1970年代建筑学领域的重要思潮，萌芽于欧洲大陆，在二战后的英国得到蓬勃发展，再广泛传播到其他地区。英国建筑评论家雷纳·班汉姆（Reyner Banham）认为：“粗野主义是现代主义建筑的一个分支”，“是一场建筑美学而非社会伦理运动”[1]。而以史密森夫妇（Alison & Peter Smithson）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建筑师则倡导粗野主义是“一个关于社会伦理的哲学陈述”[2]。粗野主义学派主张采用天然粗糙的材料，以“如其所是”（As found）的建构方式呈现材料的原真性，以内部空间的构成来推导出建筑外观形态[3]；通过这些手法，寓意二战以后城市、社会与人的“不完美”（imperfectability），并展现对“力量、韧性、简朴、耐久、永恒”等道德伦理的追求[4]。这些观念不指涉具体的建筑材料，但是混凝土的坚固、粗粝及可塑性使其成为粗野主义实践的最佳选择[5]。对粗野主义在伦理、哲学等层面的研究，还包含纪念性（Brutalist

作者：
杨震，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育部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烨，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778076），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2019YFD1100804）。

DOI: 10.12285/jzs.20201111001

monumentality）[6]、政治性（Brutalist politics）[7]、行动建筑（Action Architecture）[8]等。相关研究还包含对粗野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9]；英国新粗野主义运动及其社区实践[10]；欧洲、美洲、亚洲的粗野主义在地化演变[11]等。

2. 粗野主义革命性及争议

粗野主义是对以"密斯学派国际风格"（Miesian International Style）为主导的现代主义教条（Orthodox Modernism）的一种挑战和颠覆[12]。粗野主义学派认为"国际风格"的无差别特征，强化了"对现代社会虚无感的恐惧"（a modern fear of nothingness）[13]。原来的粗野主义对经典美学也不感兴趣，而力图创造"对抗、暴力、反理性"的建筑新意象[14]。关于粗野主义的争论广泛存在并延续至今：2016 年，英国交通大臣约翰·海耶斯（John Hayes）反对在城市复兴中保护粗野主义建筑，认为其是一种"丑陋崇拜"（a cult of ugliness）[15]；2020 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发起名为"使联邦建筑重现美丽"（Making Federal Buildings Beautiful Again）的行政草案，要求联邦建筑遵循"古典主义风格"，禁止"使用粗野主义、解构主义等一切具有现代主义特质"的风格[16]。粗野主义建筑的境遇也呈现兴废不一的分化：其中一些遭遇了严重的社会及物质衰败，甚至被拆除——例如伦敦的罗宾汉花园社区（Robin Hood Gardens）；另一些则成为政府登录在册的历史保护建筑——例如同样位于伦敦的巴比肯社区（Barbican Estate）[17]。

3. 粗野主义市政建筑实践

粗野主义建筑实践涵盖居住、文教、市政等类型[18-20]。其中市政类主要指具备政治管理、市政服务等功能的建筑，包括市政厅、议会厅、警察局等。这一类型数量多、分布地域广。笔者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 18 项（表 1，图 1）。

具有代表性的粗野主义市政类建筑 表 1

序号	项目时间（年）	项目名称	地点	建筑师
1	1951—1958	Secretariat Building 秘书处大楼	Chandigarh，India 昌迪加尔，印度	Le Corbusier 勒·柯布西耶
2	1951—1964	Palace of Assembly 议会大厦	Chandigarh，India 昌迪加尔，印度	Le Corbusier 勒·柯布西耶
3	1954—1958	Kagawa Prefectural Office 香川县厅舍	Kagawa，Japan 香川县，日本	Kenzo Tange 丹下健三
4	1958—1960	Kurashiki City Hall 仓敷市政厅 （现为仓敷市艺术博物馆）	Kurashiki，Japan 仓敷，日本	Kenzo Tange 丹下健三
5	1959—1973	Pforzheim City Hall 普福尔茨海姆市政厅	Pforzheim，Germany 普福尔茨海姆，德国	Rudolf Prenzel 鲁道夫·普伦泽尔
6	1962—1968	Boston New City Hall 波士顿市政厅	Boston，America 波士顿，美国	KMK 格哈德·卡尔曼、迈克尔·姆金奈尔、爱德华·诺尔斯
7	1962—1969	Bensberg Town Hall 本斯伯格市政厅	Bensberg，Germany 本斯伯格，德国	Gottfried Böhm 戈特弗里德·伯姆
8	1962—1983	National Parliament House 国民议会大厦	Dhaka，Bangladesh 达卡，孟加拉国	Louis I. Kahn 路易斯·康
9	1963—1967	Orange County Government Center 奥兰治县政厅	Orange，America 奥兰治县，美国	Paul Rudolph 保罗·鲁道夫
10	1964—1975	J. Edgar Hoover Building 约翰·埃德加·胡佛大厦（FBI 总部）	Washington，America 华盛顿，美国	Charles Murphy 查尔斯·墨菲
11	1966—1967	City Hall and Magistrate Court 市政厅及地方法院	Brantford，Canada 布兰特福德，加拿大	Peter Biedermann & Werner Böninger 彼得·比德曼和韦纳·伯宁格
12	1966—1968	Fremont Civic Center 弗里蒙特市政中心	Fremont，America 弗里蒙特，美国	Robert Mittelstadt 罗伯特·米特尔斯塔特
13	1970—1976	Cameron Offices 卡梅隆办公楼	Canberra，Australia 堪培拉，澳大利亚	John Andrews 约翰·安德鲁斯
14	1971—1974	Buffalo City Court Building 布法罗市法院大楼	Buffalo，America 布法罗市，美国	Pfohl，Roberts and Biggie Studio 菲尔，罗伯茨与比吉事务所
15	1972—1978	Dallas City Hall 达拉斯市政厅	Dallas，America 达拉斯，美国	I. M. Pei and Partners 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
16	1978—1979	State Government Offices 州政府办公楼	Geelong，Australia 吉朗，澳大利亚	Buchan Laird & Bawden 巴肯·莱尔德与鲍登
17	1980	West Palm Beach City Hall 西棕榈滩市政厅	Florida，America 佛罗里达，美国	John Marion 约翰·马里恩
18	1985	Ruse City Hall 鲁塞市政厅	Ruse，Bulgaria 鲁塞，保加利亚	Alexander Georgiev Barov 亚历山大·乔治·巴罗夫

其中，市政厅（City Hall）占据了大量比例。在西方城市中，市政厅被视为民主政体和公共权力的象征，具有强烈的政治符号色彩，市民对市政厅有一种潜在的"所有权意识"，对它们的设计和建造十分敏感；市政厅建设还与城市更新紧密相关，能起到促进城市转型发展的作用。因此，市政厅建筑具备一种多维度、典例性的研究价值。但在既有研究中，对粗野主义市政厅建筑的探析呈现不足，尤其缺乏关于建筑与文化—城市复杂关联的深入讨论。基于此，本文以波士顿新市政厅（Boston New City Hall）为案例，回顾这座建筑对城市发展和建筑文化的影响，进而探讨建筑的价值及历史定位。波士顿新市政厅于 1962 年启动设计，1968 年建成，是继勒·柯布西耶昌迪加尔行政群建筑之后，在城市发展和建筑文化两个层面影响最大的粗野主义市政建筑[21]。它的设计与建造是波士顿城市更新中的重要环节，推动了波士顿从衰败之城蜕变为美国东海岸经贸中心，并促成了建筑领域"波士顿学派"的兴起。

但对它的评价分化成对立的两极：既曾被选为美国近代最伟大建筑之一，又曾被贬低为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22]。在中文文献中，对其只有早远、片段的叙述[23]。

二、案例研究：波士顿新市政厅设计述评

1. 城市传统

波士顿是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位于大西洋入海口区域，自 18 世纪以来凭借港口贸易、工业制造和快速城镇化成为美国东海岸的政治和经济中心。19 世纪中期以前，波士顿规划受英国“如画城镇”模式（picturesque）影响较大，在城市中心区建设中体现出肌理致密、缺乏中心感等英国城镇的特点；19 世纪 30 年代之后，以法国巴黎为代表的布扎体系（Beaux-Arts）输入到波士顿，在新的城市建设中开始运用网格化的土地划分、宽阔的林荫道、仪式性的轴线等欧陆城市的规划手法。波士顿老市政厅也带有明显的巴洛克风格（图 2）。直到 20 世纪前半叶，波士顿都带有“保守主义”色彩，城市精英与民众普遍赞赏古典主义建筑，现代主义“几乎无迹可寻”[24]。

2. 建设背景

1920—1950 年代，在金融危机，工业转移，二战后迅猛的郊区化等重大事件叠加影响下，波士顿城市中心呈现迅速空心化；再加上政党纷争、政治腐败、族群对立等问题，使波士顿经济发展更趋乏力，城市面貌显著衰败，成为“一座病入膏肓的城市”[25]。与北美其他城市类似，波士顿政府开启了“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意图以大规模社区拆建、市政设施及标志性建筑的建设来刺激经济，扭转城市危局[26]。在此背景下，位于城市中心区与港口区交界地带的斯考利广场（Scollay Square，占地 24 公顷）被整体拆除，规划为波士顿新市政厅所在地。

3. 设计哲学

城市衰败使波士顿人对“旧文化和旧事物”产生了怀疑与不满，人们希望借由“一场城市建筑的革命”，向世界表明“波士顿愿意进行现代化”[27]。同时，在欧洲现代主义运动感染下，许多人的审美偏好发生变化，认为现代主义作为有价值的先锋艺术（avant-garde），是对政治—经济困局的“一剂文化解药”[28]。

新市政厅的规划，决策过程及设计哲学反映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

（1）首先由贝聿铭（I. M. Pei & Partners）编制了包含斯考利广场范围在内的政府中心城市更新规划（Government Center Urban Renewal Plan）。新规划的建筑采取大尺度的矩形、条形、半月形等平面，围合出互相联通的市政广场，新市政厅被置于最大广场的东侧中心。规划设定了新建筑的高度、体量和占地面积（对风格、外观与材料并没有要求），预控了场地与西侧比肯山（Beacon Hill）、东侧法尼尔大厅（Faneuil Hall）等历史地标的视线及交通连接，并考虑了与更远处城市中心和港口区在形态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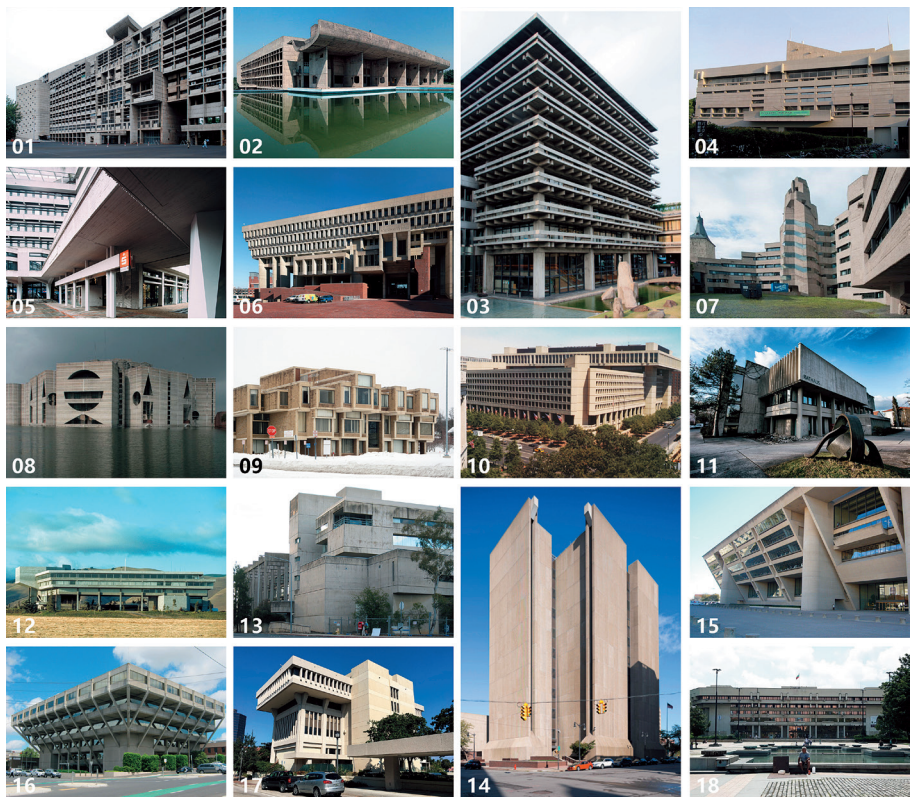

图 1：具有代表性的粗野主义市政类建筑

图 2：巴洛克风格的波士顿老市政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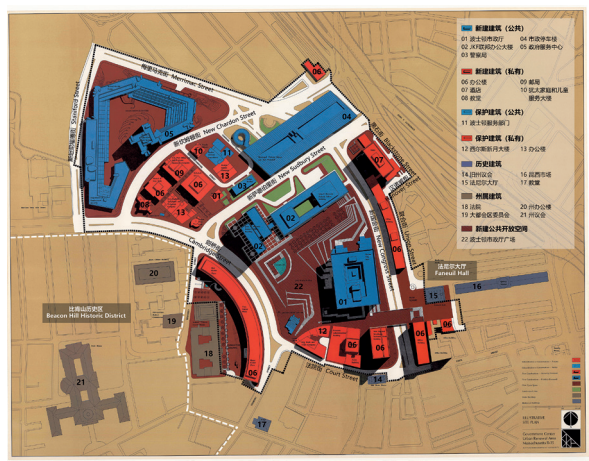

图 3：贝聿铭编制的政府中心城市更新规划

功能上的关系。规划摒弃了古典主义手法，体现出强烈的现代城市设计色彩（图 3）。

（2）波士顿政府于 1962 年发起全美范围内的竞赛，征集新市政厅设计方案。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第一个大型市政厅设计竞赛[29]。评委会由建筑师及商界代表组成，其间没有政府官员，评委会拥有完全决定权。尽管评委的背景和经历差异极大，但从 256 份匿名提案中选出的八份决赛作品全部是现代主义风格，这被媒体称为“奇迹中的奇迹”[30]。公开、民主的评选过程避免了潜在的政治操弄和专业偏见，政府借此再次传递出塑造“诚实、开放、进取的新波士顿”的决心[31]。这次活动也是美国现代设计竞赛制度的肇始，启发了一系列类似竞赛。

（3）建筑师联合体 KMK[32] 的提案从八份决赛作品中被确定为实施方案。KMK 核心人物格哈德·卡尔曼（Gerhard Kallmann）一直强调形式追随功能、反对复古、重视人的体验感等，这些都是现代主义的思想范畴。但卡尔曼认为现代主义已站在十字路口：因为密斯学派的“方盒子美学”被大量复制，成为新的教条，扼杀了现代主义的原创性和进步性。KMK 将新市政厅设计视为一份挑战性的宣言，宣称应以物理上的“具体性和坚固性”（concreteness and firmness）和形态构造上“无情的诚实”（brutal honesty），来对抗现代主义教条“无害的乏味”[33]。这些主张，与波士顿政治及文化意识形态的潜在变化形成了共振。

4. 建筑分析

1）外观形态

新市政厅占地约 0.9hm^2，建筑面积约 4.8 万 m^2，共 9 层，被置于一个从西向东倾斜的不规则形状的大型红砖广场上。新市政厅外观上最显著的特点是自下而上的“三重组织”（tripartite arrangement）（图 4）：

（1）较低部分（1~4 层）是公共层（public），由从广场升起的无窗红砖实体体量构成，建筑师称之为“土丘”（the mound），其四面包含从街道及广场不同标高进入市政厅的入口，内部是与市民互动最多的日常公共服务部门。

（2）中间部分（5 层）是仪式层（ceremonial），包括从公共层升起来支撑上部结构的一系列不规则间隔的、巨大的现浇混凝土片墙，形成高悬于“土丘”上方错动凹凸的“空中壁龛空间”，在壁龛中生长出若干向外突出的现浇混凝土“罩体”（the hoods）。这些“罩体”内部是市长办公室、市议会办公室、会议厅和公共展览大厅等，建筑师希望以这种夸大的体量，来象征核心政治功能的重要性；从罩体室内可眺望周边社区和历史地标（法尼尔大厅），建筑师希望以此提醒管理者“时刻关注权力的来源和城市的历史”[34]。

（3）最上部分（6~9 层）是行政层（administrative），呈锯齿状倒金字塔形，构成一个巨型头部体量，外墙布满规律排列的窗户，窗间是鱼鳍状密集突出的双片墙，材料是预制混凝土。内部容纳了对外联系较少的市政部门。

2）内部空间

建筑师希望在内部创造“一个迷你城市”（a mini city），让官员、政府工作人员、访客、游客、普通市民在“迷你城市”的不同“社区”活动，并促进他们之间的互动。从南部入口进入公共层，是一个尺度巨大的门厅，包含类似剧场座席的连续大阶梯，向上直达仪式层。建筑师希望这个一体化的空间能承载表演、观展、休憩、交往等公共功能，激发“城市论坛”及“城市舞台”效果（图 5）。在公共层和仪式层之间的架空转换部分，有一系列错落的平台及一个内部广场，通过步道与外部街道及广场连接，建筑师希望借此破除建筑对城市步行的阻隔，创造近似游逛体验的立体步行环境（图 6）。仪式层和行政层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内向感，水平方向很少有自然光线；从屋顶天窗泻落的天光突出了公共区域和走廊，天窗下悬挑的大量叠涩状混凝土造型，强化了肃穆、冷峻的空间仪式感（图 7）。

3）材料构造

建筑外墙材料自下而上分别是深色红砖、粗粝的现浇混凝土、光滑的预制混凝土。红砖是波士顿传统建材，也是广场铺地的主材料。建筑师希望由此强化建筑与场地的关联。建筑内部的材料构造方式与外观非常相似：公共层的地面仍然是红砖，柱子和墙面由现浇混凝土建造；成对

图 4：波士顿新市政厅外观形态，西侧视点（左）及北侧视点（右）

图 5：波士顿新市政厅门厅

图 6：波士顿新市政厅位于公共层和仪式层之间的架空平台

图 7：波士顿新市政厅内部天窗及叠涩状混凝土造型

的预制空腹桁架支撑预制天花板，基础设施（通风管道、电气系统及照明）被整合到开放式的天花板中；许多室内固定装置也由超出常规尺度的现浇混凝土制作，例如工作台面、踏步等；局部公共区域使用了深重的金属板材（图 8）。可以看到，混凝土不但是结构材料，也作为表皮、楼板、墙壁甚至家具装置被使用。但是，建筑师的兴趣并非在于混凝土的结构效能，而是在尽其所能地创造一种“极致性”（“all-through-ness”）——*“如果可以，我们甚至会使用混凝土来制作灯的开关”*，以寻求达致最强的“具体、坚固、诚实”[35]。

4）外部广场

建筑师同时设计了新市政厅的外部广场。广场顺应地形自西向东逐级下降，形成若干平台和踏步；广场被有意识地保持空旷，没有布置在美国城市公共空间常见的乔木、草坪和城市家具（图 9）。建筑师希望广场成为一个整合性的步行通道（a pedestrian passageway），而非一个在波士顿常见的城市公园[36]。但建筑师也希望能创造类似欧洲“市民广场”的效应，吸引市民在此聚集并开展多样化的社会活动[37]。

图 8：波士顿新市政厅内部大量混凝土构造

图 9：波士顿新市政厅外部广场

5. 主要争论

1）建筑美学与文脉

新市政厅粗野主义美学风格引发了大量争论。许多建筑师、评论家、早期政治家持赞赏态度，其中包括现代主义的主要实践者沃尔特·格罗皮乌斯、贝聿铭、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及多任波士顿市长等。他们认为粗野主义的“大胆”（boldness）正符合一座伟大城市在一个变革时代的雄心，是创新性的城市地标（a showcase），具备在政治和文化层面的进步意义[38]。1970 年，美国建筑师协会在新市政厅举行年会，体现了业界主流对粗野主义的积极态度[39]。但对于许多“外行”民众而言，新市政厅的文脉来源令人迷惑：它的倒金字塔造型和复杂的混凝土构造被不同人解读为“埃及式”“哥特式”“古希腊式”“中国式”等[40]。许多人认为它“咄咄逼人”“压倒一切”，与波士顿古典主义城市传统不协调，破坏了城市的“庄严”（stateliness）和“永恒魅力”（timeless appeal）[41]，也被一些人视为是自上而下的城市更新夷平社区肌理的典例[42]。综合而言，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两种二元对立：现代主义与保护主义（preservationist），建筑师与非建筑师。但这种二分法也并不绝对，许多观点因人而异或因时而异；不变的是，关于新市政厅美学及文脉的争论，一直没有取得总体性的共识。

2）功能与公共空间

建筑师力图在新市政厅创造一个“迷你城市”般的、整合性的功能模式。但一些评论家认为，自下而上的“三重组织”暗合了古典建筑的功能安排：下部是公共

服务空间（service space），中部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主人使用的重要房间（principal rooms），顶部是仆人区域（servants' quarters）。这种"层级化"的组织被认为并不完全符合现代主义追求效率与流动的理念，仍然是"政府官僚机制"的一种空间显化[43]。首层公共门厅的确承载了大量的社会用途，包括官员就职典礼、城市事务发布、展览、演出、休憩等，形成突出的场所特性。但公共层与仪式层之间大量的踏步和平台转换则毁誉参半，一些游客或者建筑探访者喜欢这种空间与高差的复杂性造成的体验感，而很多前来办事的市民则抱怨这是一个令人迷惑的"迷宫"[44]。仪式层外部的架空平台及内部广场，也长期处于半封闭及半废置状态，与建筑师设想的创造一个联通城市的立体步行环境相去甚远（图 10）。

硬景化的外部广场也备受争议。赞扬者将它视为是欧洲市民广场来到了美国城市；而反对者则认为将"纪念性与平民化"（monumental and populist）合二为一是欧洲的范式，并不符合美国城市生活的需求[45]。的确，空旷的广场缺乏明确的围合感和方向感，也缺少荫蔽，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的步行体验不佳。1999 年，公共空间研究机构（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甚至将新市政厅广场称为"充满耻辱的场所"（Hall of Shame）[46]。然而，在一些节事活动期间，广场内的确可以承载多样化的社会活动，形成许多"社交生境"（图 11）。由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广场社会性的提升更有赖于创新性的使用和有效管理[47]。

三、进一步讨论：波士顿新市政厅的影响

1."波士顿学派"兴起

尽管在许多方面毁誉参半，但新市政厅的巨大示范效应促进了波士顿建筑风尚的转变，使现代主义成为 1970 年代波士顿建筑实践的主流偏好，特别是促进了粗野主义观念及手法的传播。在约十年时间内，波士顿中心区涌现了十几个类似的项目，包含学校、银行总部、教堂、海洋馆、图书馆、公寓等多种类型。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采取简洁的几何造型，主要应用"严肃及逻辑清晰"的混凝土材料，大量暴露结构与构造细节来传递"原真和诚实的美"，呈现出与古典建筑"无谓冗余的装饰性"截然不同的态度（in a no-nonsense, no frills manner）（表 2，图 12）。评论家认为新市政厅"搅动了这座城市砖与花岗石的古板特征""将波士顿重新绘入建筑学的地图"[48]。今天，新市政厅周边地段的建筑已形成新旧并存、各具特色的活跃局面，整个波士顿中心区呈现不同时期城市肌理的并置与重叠（英式、欧陆、现代主义等），鲜明反映出当代大都市发展的动态性及风貌"拼贴"的特征（图 13）。波士顿被认为不再是拘泥于传统的"保守之城"而成为美国东海岸建筑实践的前沿[49]。这种转变，与新市政厅的开创密不可分。有研究者进而将包括 KMK 在内的波士顿混凝土建筑实践者统称为"波士顿学派"（Boston School，实践跨度为 1950 年代末期到 1970 年代中期），其中包括柯布西耶、贝聿铭、塞特（José Luis Sert）、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马塞尔·布劳尔（Marcel Breuer）、爱德华多·卡塔拉诺（Eduardo Catalano）等多位现代主义巨匠[50]（表 2）。他们在波士顿的混凝土建筑实践的多样性、表现力、完成度超过其他任何美国城市，缔造了一座"英雄主义的混凝土建筑之城"（a city of heroic concrete architecture），形成与"查尔斯·布尔芬奇的古典主义波士顿"（Charles Bulfinch's Boston）等量齐观的局面[51]；新市政厅被视为这股革命性潮流的滥觞及其中翘楚（图 14）[52]。

图 10：架空平台及内部广场长期处于半封闭及半废置状态

图 11：新市政外部广场上的社会活动

2. 促进波士顿城市转型

新市政厅促进了波士顿政治风气的转变。1960 年代的政治家以设计中传递出的"诚实""耐久""开放"来形容波士顿治理的转型方向[53]。在其后近 30 年内，新市政厅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在此选举了波士顿历史上首位女性议会议长（1976 年）、首位黑人议长（1986 年）、首位西班牙裔议员（2003 年）及首位意大利裔市长（1993 年）等[54]。新市政厅开放式的设计使大量民众参与了这些历史性的事件，见证城市摒弃"保守与腐败"，塑造新的政治体系和形象[55]。外部广场也成为许多公众抗议活动的聚集地（例如 1970 年代反越战），它的设计"迫使政治家们

1950—1970 年代波士顿粗野主义建筑 表 2

序号	项目时间（年）	项目名称	建筑类型	建筑师
1	1958—1963	Carpenter Center for the Visual Arts 卡彭特视觉中心	教育	Le Corbusier 勒・柯布西耶
2	1958—1967	Holyoke Center 哈佛大学霍利奥克中心	文化	José Luis Sert 何塞・路易斯・塞特
3	1960—1966	State Street Bank building 道富银行大厦	商业	F. A. Stahl Associates
4	1962—1964	Peabody Terrace 皮博迪大楼	住宅	José Luis Sert 何塞・路易斯・塞特
5	1962—1968	Children's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儿童医院药物中心	医院	TAC 协和建筑师事务所
6	1962—1969	New England Aquarium 新英格兰水族馆	文化	Cambridge Seven Associates 剑桥七人事务所
7	1962—1971	Government Service Center 政府服务中心	行政	Paul Rudolph 保罗・鲁道夫
8	1963—1966	Boston Architectural Center 波士顿建筑学中心	文化	Ashley，Myer & Associates 阿什利，迈尔事务所
9	1965	Countway Library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哈佛大学医学院图书馆	文化	Hugh Stubbins 休・斯塔宾斯
10	1966—1972	Boston Five Cents Savings Bank 波士顿五美分储蓄银行	商业	Kallmann and McKinnell 卡尔曼和姆金奈尔
11	1967—1970	Charlestown Branch Library 查尔斯顿图书分馆	文化	Eduardo Catalano 爱德华多・卡塔拉诺
12	1967—1971	Government Center Parking Garage 政府中心停车库	行政	Kallmann and McKinnell 卡尔曼和姆金奈尔
13	1967—1973	Church Park Apartments 教堂公园公寓	住宅	TAC 协和建筑师事务所
14	1967—1977	Madison Park High School 麦迪逊公园高中	文化	Marcel Breuer & Associates 马塞尔・布劳尔事务所
15	1968	The Eastern Airlines Terminal at Logan Airport 洛根机场东航站楼	交通	Minoru Yamasaki 山崎实
16	1969—1973	Christian Science Church Center 基督教科学派中心	文化	I. M. Pei and Araldo Cossutta 贝聿铭和阿拉尔多・科苏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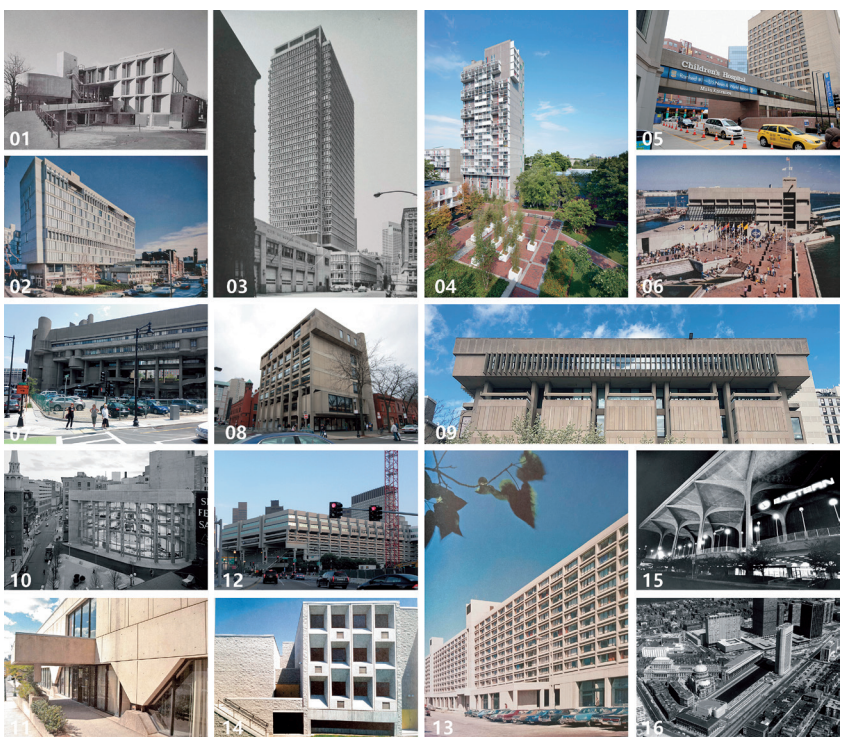

图 12：1950—1970 年代波士顿粗野主义建筑

目睹这些活动”（市长和议长办公室直接俯瞰广场，无法回避或隔绝民众的述求）[56]。尽管 1970 年代以后美国社会的政治偏好又发生转变，但新市政厅仍被广泛视为波士顿当代政治转型的重要象征。

新市政厅也成功促进了城市的经济转型。它扭转了港口区边缘长期以来“城市后门”的破落形象。在其开建后不久，美国若干金融机构就组成投资体，购买波士顿政府债券。在资金支持下，波士顿政府在新市政厅周边建设了更多新的行政机构，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政府中心项目”（Government Center Project），“滚雪球效应”吸引了更多私人企业开发，最终在政府中心南侧集聚形成波士顿金融区（Boston Financial District）。今天，该区域内任何一栋办公楼的税收贡献，都超过新市政厅建设之前斯考利广场的税收总和[57]。1980 年代以后，得益于金融区奠定的经济基础，政府开始实施更多的文化、社区、基础设施更新：例如在东侧长期衰败的港口区陆续建成法尼尔大厅市场（Faneuil Hall Marketplace）、滨水步道（Barbour Walk）、北端历史住区（North End）等；为促进中心区与港口区的缝合，又开展了广为人知的大开挖（Big Dig），建成了波士顿中心绿道。新市政厅是所有这些工作的起点和催化剂，被称为“新波士顿的心脏”[58]（图 15）。

3. 更大范围的建筑影响

在波士顿之外的其他地方，新市政厅打破了市政厅设计中“古典主义建筑范式的统治”。人们认识到市政厅建筑并不必然用“穹顶、柱廊和中轴对称”来体现重

图 13：波士顿中心区呈现出城市风貌“拼贴”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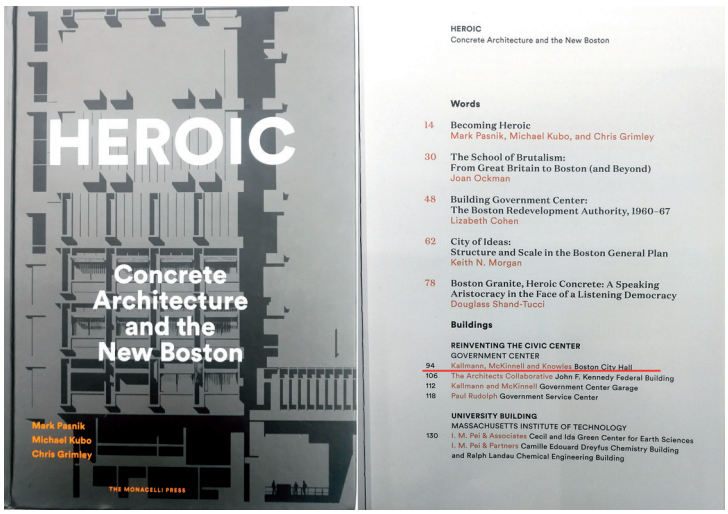

图 14：波士顿混凝土建筑研究专著，封面（左）与目录（右），KMK 的新市政厅排在第一位

图 15：新市政厅带动了周边区域的更新及项目开发

要性，现代建筑更符合政治改革和发展转型的意识形态，而且当时混凝土成本也低于钢材。这些因素使美国许多城镇“都希望拥有一个小波士顿市政厅”，并在其周边建设更多市政建筑来促进城市更新[59]。芝加哥、达拉斯、沃斯堡等 10 余个美国城市建成了类似项目（表 1，图 1）。其中，贝聿铭设计的达拉斯市政厅（Dallas City Hall，1972—1978 年）采取倒金字塔形态、多重立面组织、大量悬挑与架空等，被认为与波士顿新市政厅具有“血缘关系”（a conspicuous child）（图 16）[60]。甚至在政治层面，达拉斯都同样希望用新市政厅来树立新的政治形象，以消除 1963 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后的社会怨怒与失望[61]。类似影响还传递到联邦政府层面，1960 年代联邦政府要求：联邦建筑应该用“最能体现当代美国建筑思想的设计”，采用具有“可靠性”的材料与方法，不应再“模仿”，而应创造别人学习的“范型”（a model to others）[62]。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大楼、中央情报局大楼、加拿大大使馆等重要建筑都采用了粗野主义风格，以响应这种要求。影响还传递到欧洲，类似案例包括英国伯明翰的中央图书馆等[63]。

上述许多建筑的外部空间也类似波士顿新市政厅广场，以硬景（hardscape）和空旷的场地来突出建筑的主体性和仪式感，并创造建筑师所希冀的“更大的社会使用的弹性”。典型案例是贝聿铭设计的基督教科学派中心（Christian Science Center，1964—1973 年）（图 17）。波士顿新市政厅“迷你城市”式的空间营造同样具备范型意义，影响了其后许多大型公共建筑的空间设计，例如约翰·波特曼（John Portman）设计的一系列整合型的综合体建筑[64]。

更重要的是，新市政厅践行了 1960 年代一批年轻建筑师破除密斯学派国际主义教条的信念，将现代主义建筑实践从“僵化的玻璃与钢的方盒子”窠臼中释放出来，重新赋予其创新性以及促进社会变革的理想。有研究者认为，新市政厅是“柯布西耶的粗粝表皮包裹的格罗皮乌斯的理性常识”（Gropius-inspired common sense was being clothed in a rough skin derived from Le Corbusier），它“回归建筑实体”（a return to the solid mass），是现代主义先锋性和伦理的真正体现；其间还体现出国际主义最缺乏的对文脉的关注——新市政厅将波士顿传统红砖与混凝土的结合，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用传统秘密来生产现代魔术”，是一种“唤起式的历史主义”（evocative historicism）[65]。总体而言，新市政厅促进了现代主义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同时由于它对国际主义教条的反正，及它自身在伦理内涵、总体形态、美学意象等方面呈现的“复杂性和矛盾性”（contradictions and complexities），已使它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念形成某种共鸣。一些研究者因此将其定义为“晚期现代主义”（late Modernist），认为不论是它的优点与缺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后现代主义的源起[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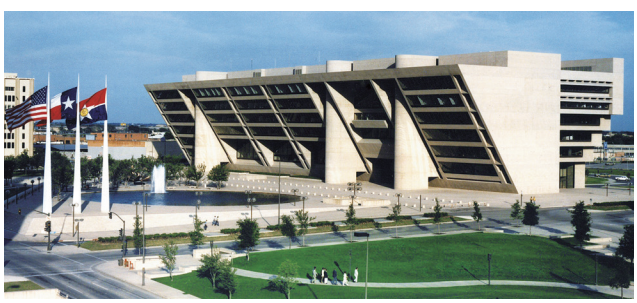

图 16：贝聿铭设计的达拉斯市政厅

图 17：贝聿铭设计的基督教科学派中心

四、总结与探讨：价值、社会评价及历史定位

新市政厅对波士顿的城市转型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它再次说明标志性建筑具备塑造意识形态及提升政治经济的潜在价值。古根海姆美术馆创造的“毕尔巴鄂效应”（Bilbao effect），实际上在波士顿新市

政厅案例中早有鲜明体现。另一方面，新市政厅激发了一座城市的建筑“革命”，进而在实践和学术两个层面推动了现代主义的发展，尤其实质性地扩展了粗野主义的内涵，成功地将“一个关于社会伦理的哲学陈述”提升为十余年内美国建筑实践的主流之一，并引领了一个虽短暂但却影响巨大的“波士顿学派”的诞生。

有意味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市政厅变化的社会评价映射了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流变。1950—1960 年代，城市衰败使“推陈出新”成为强烈的社会吁求，彼时盛兴的凯恩斯主义又提供了有力的政治背书，新市政厅凭借对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教条的双重颠覆，成为民众及政府求变意志的建筑宣言，因此受到较广泛的赞誉。1970 年代之后，由于越战与水门事件，社会民众对政府丧失信心，新市政厅寓意的“具体、坚固、诚实”反而成为某种“反讽”，不少人对其心生罅隙，视之为政治霸权的象征，而对“城市更新”的反思加剧了一些民众对它的负面评价。1980 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及世界范围内威权政体的崩解，使纪念性的建筑符号更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与城市融为一体、不需要强烈特色（faceless）”[67]的市政厅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对新市政厅的评价因此更加两极分化。近年来，美国政治中保守主义盛行，典型政治人物的建筑偏好再度回归古典风格（如前文所述的唐纳德·特朗普）；但新市政厅曾经的政治象征，无论是“改革”还是“自大”，似乎已被许多人所遗忘，仅剩对建筑风格“美与丑”的表层观感。

相应地，对新市政厅是否是某种“历史遗产”，也存在巨大的争议。许多保护主义者将其视为“自上而下城市更新运动”和“现代主义多变建筑潮流”（perpetual architectural change）的代表，认为与历史保护的价值观相去甚远[68]。近 10 年来，波士顿政府考虑过各种外观改造方案，甚至提议将其出售乃至拆除重建[69]。而另一方面，一些建筑师和市民一直在呼吁将新市政厅纳入“波士顿地标”（Granted Landmark Status），以获得严格及永久的保护[70]。2020 年 4 月，KMK 核心人物迈克尔·姆金奈尔（Michael McKinnell）病逝，被媒体报道，新市政厅的重要性再一次受到广泛讨论[71]。

笔者认为，唯有在社会变迁中去追溯建筑，才能明晰其真正的价值及探讨潜在的历史定位。基于前文所有论述，波士顿新市政厅也许不是一个完美的建筑，但却是对一个历史时代中现实缺陷和迫切需求的回应，也是对思想及文化教条的颠覆；许多这些缺陷、需求和教条，在今天仍然广泛存在，并仍然是建筑学需要直面的挑战；此外，新市政厅并非纸上谈兵的思想产物，它对一座城市转型发展的推动是真切的，对建筑文化的革命性引领也是深刻的。建筑史上许多重要遗产，都经历过肯定—否定—再认识的过程；而且，历史遗产的认定与个人喜好无关，当建筑具有显著的历史价值时，建筑师和政治人物就应该担负起保护它的责任[72]。笔者相信，正如同粗野主义在建筑学谱系中已占据一席之地，新市政厅的历史地位有望在未来得到更加客观的认知。

注释

[1] Banham, R. The New Brutalism: Ethic or Aesthetic?[M]. Lond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66.

[2] Henley, S. Redefining Brutalism[M]. Newcastle upon Tyne: RIBA Publishing, 2017.

[3] 史密森夫妇在一次讨论中使用了“如其所是”（As found）这个说法来概括他们的粗野主义设计方法和思想。“As found”直译为中文意思是“像某种事物已经成为的那样”，或者“按照某种事物本来的样子”。参见：朱渊.“如是”（As found）美学初探[J].建筑师，2012 (01)：13-18.

[4] 同注[2].

[5] Beanland, C. Concrete Concept: Brutalist Buildings Around the World[M].London: Frances Lincoln, 2016.

[6] Pasnik, M, Kubo, M, Grimley, C. Heroic: Concrete Architecture and the New Boston[M].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2015.

[7] Mould, O.Brutalism Redux: Relational Monumentality and the Urban Politics of Brutalist Architecture[J]. Antipode, 2017, 49 (3)：701-720.

[8] “行动建筑”是波士顿新市政厅的核心建筑师之一格哈德·卡尔曼（Gerhard Kallmann）的主要建筑理念。参见：Kallmann, G. The Action Architecture of a New Generation[J]. Architectural Forum, 1959, 111: 133.

[9] 朱亦民.史密森夫妇与粗野主义建筑思想[J].建筑学报，2019 (06)：118-124.

[10] 高巍，赵玫.美学、伦理与社区乌托邦——英国新粗野主义社会住宅[J].建筑师，2019 (02)：72-79.

[11] Frampton, K. 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M].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92.

[12] 同注[11].

[13] Sirman, B. Concrete Changes: Architecture, Politics, and the Design of Boston City Hall[M].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8.

[14] 同注[13].

[15] 参见媒体报道：Government Declares War on Brutalist Architecture（资料来源：https: //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

[16] 参见媒体报道：Make Federal Buildings ´Beautiful Again?´Trump Declares War on Modern Architecture。资料来源：https: //chicago.suntimes.com/2020/2/5/。

[17] 杨震，于丹阳.从“昙花一现的未来模式”到“现代主义的更新范例”：伦敦巴比肯重建回顾及对城市更新的启示[J].建筑师，2020 (03)：18-27.

[18] Clement, A. Brutalism: Post-war British Architecture[M]. London: Crowood, 2011.

[19] 高巍，赵玫.粗野主义与社区雄心——1960—1970年代英国新排屋社会住宅实验[J].建筑学报，2017 (09)：7-11.

[20] 同注[5].

[21] 同注[6].

[22] 同注[13].

[23] 目前在建筑学中文权威期刊中，以波士顿新市政厅为主题的论文仅一篇，发表于2009年，主要是对新市政厅概念性改造方案的介绍，对其历史来源、价值分析等方面涉及很少。参见：沈杰，李世元，蔡新强.历史标志性建筑的更新及功能与文化的统一——波士顿市政厅改建方案概析[J].建筑学报，2009 (11)：100-103.

[24] Holleran, M. Boston´s Changeful Times: Origins of Preservation and Planning in America[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25] 同注[13].

[26] O´Connor, T H. Building a New Boston: Politics and Urban Renewal, 1950 to 1970[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5.

[27] Clarke, T. Building Boston: Stories of Architectural and Engineering Feats[M]. Atglen: Schiffer, 2016.

[28] 杨震，罗通强.城市片区风貌营造与保护——波士顿后湾城市设计分析及其借鉴[J].建筑学报，2020 (08)：65-71.

[29] 在波士顿新市政厅之前，仅有1909年的旧金山市政厅设计竞赛。

[30] 同注[13].

[31] 同注[13].

[32] KMK的三位核心建筑师是格哈德·卡尔曼（Gerhard Kallmann）、迈克尔·姆金奈尔（Michael

McKinnell)、爱德华·诺尔斯(Edward Knowles)，前两位在英国接受的建筑学教育，受到了深刻的现代主义熏陶。

[33] Kallmann, G, McKinnell, M. Original Thinking: Reflections on the Genesis of Boston City Hall[J]. ArchitectureBoston, 2005 (03)：34.

[34] 同注[33].

[35] 同注[13].

[36] 同注[33].

[37] 同注[33].

[38] 同注[13].

[39] Sales, R. Architects, Students to Meet in Hub[R]. Boston Globe, June 21, 1970.

[40] 同注[13].

[41] 同注[13].

[42] 同注[26].

[43] Shelter, F. Designing for Civil Defense in the Cold Wa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44] 同注[13].

[45] Goodsell, C T. The Social Meaning of Civic Space: Studying Political Authority through Architecture[M].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8.

[46] 参见：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Boston City Hall (资料来源：https: //www.pps.org/great_public_spaces)。

[47] 同注[13].

[48] 同注[13].

[49] 同注[6].

[50] 同注[6].

[51] 查尔斯·布尔芬奇(Charles Bulfinch)是19世纪美国建筑师，在波士顿设计了大量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作品，对19世纪的波士顿城市空间营造产生了很大影响。参见：杨震，罗通强.城市片区风貌营造与保护——波士顿后湾城市设计分析及其借鉴[J].建筑学报，2020 (08)：65-71.

[52] 同注[13].

[53] 同注[6].

[54] 同注[13].

[55] 同注[13].

[56] 同注[13].

[57] 同注[13].

[58] 同注[27].

[59] 同注[13].

[60] Miller, N, Morgan, K. Boston Architecture, 1975-1990[M].Munich: Prestel-Verlag, 2011.

[61] 同注[13].

[62] 同注[13].

[63] 同注[5].

[64] 同注[11].

[65] 同注[13].

[66] 同注[13].

[67] Prudon, T H M. Preservat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e[M].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08.

[68] 同注[45].

[69] Schneider, G. 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 The Problem of Heroic Modernism[J]. ArchitectureBoston, 2005 (03)：44.

[70] Boston Landmarks Commission. Boston City Hall[R] Landmark Petition Forum, April, 2007.

[71] 参见媒体报道：In Tribute to Michael McKinnell, The Heroic Architect Behind Boston City Hall。资料来源：https: //www.archpaper.com/2020/03/。

[72] 一些研究者呼吁：对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粗野主义建筑开展全面的抢救与保护，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为此成立了一个网站"救救粗野主义"：http: //www.sosbrutalism.org/cms/15887473#_。

参考文献

[1] Banham, R. The New Brutalism: Ethic or Aesthetic?[M]. Lond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66.

[2] Beanland, C. Concrete Concept: Brutalist Buildings Around the World[M].London: Frances Lincoln, 2016.

[3] Boston Landmarks Commission. Boston City Hall[R] Landmark Petition Forum, April, 2007.

[4] Clarke, T. Building Boston: Stories of Architectural and Engineering Feats[M]. Atglen: Schiffer, 2016.

[5] Clement, A. Brutalism: Post-war British Architecture[M]. London: Crowood, 2011.

[6] Frampton, K. 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M].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92.

[7] Goodsell, C T. The Social Meaning of Civic Space: Studying Political Authority through Architecture[M].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8.

[8] Henley, S. Redefining Brutalism[M]. Newcastle upon Tyne: RIBA Publishing, 2017.

[9] Holleran, M. Boston´s Changeful Times: Origins of Preservation and Planning in America[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 Kallmann, G. The Action Architecture of a New Generation[J]. Architectural Forum, 1959, 111: 133.

[11] Kallmann, G, McKinnell, M. Original Thinking: Reflections on the Genesis of Boston City Hall[J]. ArchitectureBoston, 2005 (03)：34.

[12] Monteyne, D. Boston City Hall and a History of Reception[J].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2011, 65 (1)：45-62.

[13] Mould, O. Brutalism Redux: Relational Monumentality and the Urban Politics of Brutalist Architecture[J]. Antipode, 2017, 49 (3)：701-720.

[14] O´Connor, T H. Building a New Boston: Politics and Urban Renewal, 1950 to 1970[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 Pasnik, M, Kubo, M, Grimley, C. Heroic: Concrete Architecture and the New Boston[M].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2015.

[16] Prudon, T H M. Preservation of Modern Architecture[M].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08.

[17] Schneider, G. 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 The Problem of Heroic Modernism[J]. ArchitectureBoston, 2005 (03)：44.

[18] Shelter, F. Designing for Civil Defense in the Cold Wa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19] Sirman, B. Concrete Changes: Architecture, Politics, and the Design of Boston City Hall[M].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8.

[20] 高巍，赵玫.美学、伦理与社区乌托邦——英国新粗野主义社会住宅[J].建筑师，2019 (02)：72-79.

[21] 高巍，赵玫.粗野主义与社区雄心——1960—1970年代英国新排屋社会住宅实验[J].建筑学报，2017 (09)：7-11.

[22] 沈杰，李世元，蔡新强.历史标志性建筑的更新及功能与文化的统一——波士顿市政厅改建方案概析[J].建筑学报，2009 (11)：100-103.

[23] 杨震，罗通强.城市片区风貌营造与保护——波士顿后湾城市设计分析及其借鉴[J].建筑学报，2020 (08)：65-71.

[24] 杨震，于丹阳.从"昙花一现的未来模式"到"现代主义的更新范例"：伦敦巴比肯重建回顾及对城市更新的启示[J].建筑师，2020 (03)：18-27.

[25] 朱亦民.史密森夫妇与粗野主义建筑思想[J].建筑学报，2019 (06)：118-124.

[26] 朱渊."如是"(As found)美学初探[J].建筑师，2012 (01)：13-18.

图表来源

图1：http：//www.rmarch.net/Fremont/fremont.html (12)；https：//www.flickr.com/photos/south-beachcars/31038941725 (17)；http：//www.rmarch.net/Fremont/fremont.html (18)；http：//www.sosbrutalism.org/cms/15887473#_ (其余图片)

图2：参考文献[12]

图3：http：//www.bostonplans.org/3d-data-maps/historical-maps/urban-renewal，作者改绘

图4～图11：作者拍摄

图12：https：//www.archdaily.com/486015/ad-classics-peabody-terrace-sert-jackson-and-gourley (04)；https：//www.procore.com/casestudies/boston-childrens-hospital (05)；http：//www.sosbrutalism.org/cms/16817868 (08)；https：//countway.harvard.edu/about (09)；https：//archboston.com/community/threads/logan-airport-capital-projects.5346/page-41 (15)；作者拍摄(07)；其余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15]

图13：作者拍摄

图14：参考文献[15]

图15：Google map，作者改绘

图16：https：//www.pinterest.co.uk/pin/405886985139410512/

图17：参考文献[15]

表1、表2：作者整理绘制